

试论“汤团行动”

戴致君 张廷栖

1943年春,在苏中抗日民主根据地^①,正当日伪纠集重兵发动大规模“清乡”的时候,发生了一起整团地方抗日武装接受汪伪改编的事件。因接受改编的部队是活动在苏中第四行政区的通海自卫团,团长汤景延,副团长沈鼎立(沈仲彝),故这一事件又称“汤团行动”。

汤团行动的经过大致是这样的:日伪“清乡”前夕,中共苏中区委员会考虑到反“清乡”斗争可能出现严重困难局面,“从最坏处打算,向最好处努力”^②,决定汤团打入日伪内部,相机配合反“清乡”斗争。1943年3月底,汤景延与汪伪“特工总部江苏实验区苏北分区”区长姜颂平、伪苏北“清乡”主任公署主任张北生进行了接触。尔后,又与日军方面的代表高木进行会谈,最后议定:汤团接受伪军番号,部队建制不变,驻防地区不变。4月16日,伪方给汤团以“外勤警卫团”的番号,命汤团分驻茅镇、姜灶港、张芝山一线。

汤团打入伪军后,李士群两次在苏州“召见”汤景延,晋升汤为“少将”,改汤团的番号为“苏北清乡主任公署保安司令部第二教导大队”。5月20日,伪苏北“清乡”主任公署命令汤团集中海门接受“点编”,随即又命令汤团开赴南通城“整训”,企图控制、监视,直至

^① 按1941年3月,中共中央华中局决定,当时苏中行政区包括盐城、宝应一线以南,长江以北,黄海以西,大运河以东地区的抗日根据地,辖一、二、三、四四个行政区和兴东泰特区。

^② 转引自《江海风云录》,江苏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92页。

吃掉汤团。汤景延等团领导人与日伪作了机智、勇敢的斗争，巧妙地应付了日伪，始终保持了对部队人员、武器的控制。8月下旬，“整训”结束，日伪又别有用心地命汤团分散驻于北刘桥、石港、骑岸、金沙、金余、余西、三余、九门闸一线，团部（大队部）移驻金沙，归日军大队长山本节制。这使汤景延等对部队的掌握增加了困难。

1943年9月，反对日伪第一期“清乡”已胜利在望，汤团打入日伪已无必要，加之驻地分散，指挥管理不便，苏中区党委决定汤团举行军事暴动，把部队从伪军里拉出来。9月29日夜，驻在金沙的汤团团部在汤景延的指挥下，将伪金沙特工组长翟光耀等多人击毙，接着，冲入碉堡，俘虏了其他特工人员，摧毁了伪行动大队队部和伪区公所。驻扎在其他据点的汤团部队，也同时暴动成功。在南通警卫团的接应下，汤团全部安全到达了指定的集结地点，胜利地回到了根据地。

苏中军区和苏中四分区先后为汤团召开了祝捷大会，庆贺汤团特殊战斗的胜利。粟裕、陶勇等领导人分别在大会上表扬了英勇、机智完成党的任务的汤团指战员。经过整训，汤团编入“联抗”^①部队的建制，汤景延任“联抗”副司令。

四十多年来，对于汤团的这次行动，可以说是聚讼纷纭，毁誉不一。1944年苏中整风时，就有人批评汤团行动是“机会主义”，是“冒险”。^②十年动乱时期，汤团行动成了右倾投降主义的典型，曾经参加过汤团行动的干部、战士备受打击迫害。进入80年代，地方中共党史资料的征集、研究方兴未艾，对汤团行动的评价又重新被提上议事日程。在肯定汤团干部、战士革命气节的同时，有人仍然认为，汤团行动是“曲线救国”，应该予以否定。

笔者因为工作关系，有机会接触当年敌我双方的历史档案以

① “联抗”的全称为“鲁苏皖边区游击指挥部直属纵队、鲁苏战区苏北游击指挥部第三纵队联合抗日司令部”，1944年10月划归新四军建制。

② 洪泽1983年6月17日关于汤团问题的谈话记录，中共南通市委党史工委资料室。

及有关当事人,特别是当年中共苏中区委、苏中第四行政区地方委员会(简称苏中四地委)负责人粟裕、陈丕显、钟期光、姬鹏飞(吉洛)、钟民、陈伟达、洪泽等人的回忆和证明材料。我们认为,面对如此丰富的资料,对这桩延续了近半个世纪的公案,是应该作结论的时候了。下面,试就汤团行动谈谈我们的看法。

汤团行动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次特殊战斗。

让我们把历史推回到抗日战争时期。1938年底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就开始推行“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策略。1940年11月,日本御前会议决定,要在华中、华南和华北占领区“彻底整顿治安”、“彻底开发并获取国防资源”。^①1941年4月,汪伪“清乡”委员会召开第一次筹备会议,宣称“清乡”工作要“剿抚兼施”,“由城而乡遍及全区,将有碍和运之敌性匪共铲除歼灭”。^②1941年夏至1942年夏,日伪首先在苏南的苏(州)常(熟)太(仓)地区和(无)锡武(进)澄(江阴)地区进行“清乡”。1942年12月1日汪精卫以“清乡委员会委员长”的名义,发出《民国三十二年度上半年清乡工作训令》,确定“清乡”从苏南扩展到“苏北南通附近”,限令李士群“自4月1日起于南通附近开始苏北地区第一期清乡工作”,“于9月底前完成”。^③汪伪政府还拟定了《清乡工作实施纲要》,规定:“日本方面担任军事工作,中国方面担任政治工作”,“以坚壁清野方式彻底扫荡”。^④日伪划南通、如皋(串场河以南)、海门、启东四县为“清乡区”,在仅36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投

① 《汪精卫伪国民政府纪事》,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87页。

② 《汪精卫国民政府“清乡”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25页。

③ 《苏中四分区反“清乡”斗争档案资料选编》,南通市档案馆1983年编印,第425、427页。

④ 《苏中四分区反“清乡”斗争档案资料选编》,南通市档案馆1983年编印,第425、427页。

入“清乡”的总兵力,约计1.5万人,其兵力部署的密集程度,在华中敌后战场是罕见的。日伪为实现其在苏北的战略意图,准备在其“清乡”区作孤注一掷。日军“清乡”的“现地最高指挥官”,六十一师团师团长小林信男宣称:“(对苏北清乡)一年不成功则三年,一个师团不够还可以增兵。”伪“清乡委员会秘书长”李士群在写给苏北“清乡”头目的信中说:“牺牲十万人要清乡,即使牺牲百万人也要清乡。”臭名昭著的日本特务机构“梅机关”的代表川村敬三更是杀气腾腾,叫嚣“要用我们的血,我们的汗来完成我们的清乡工作”。^① 这些充分暴露了日伪对苏北“清乡”下了很大的决心。而坚持在这一地区的抗日武装,无论是在数量上或武器装备上,都相对处于劣势。以上就是当时苏中抗日根据地所面临的严峻局势。而本文所要论及的汤团,在这严峻的局势中,又处于一种非常微妙的地位。

汤团活动的范围主要在苏中第四行政区的通海地区。这个地区,南濒长江,东接海门、启东,西与日伪在苏北的统治中心南通城相距甚近,是南通城通向海启的走廊,战略地位相当重要。新四军东进通如海启地区以后,虽几经开辟,但仍属于党和抗日武装力量相对薄弱,不能完全控制的“同情区”。而汤团的干部和战士,虽然绝大部分是崇明县和通海地区子弟,但其中也有一部分是刚刚从旧军队中转化过来的,部队中尚存在着一些不稳定的因素。

对于即将开始的反“清乡”斗争,正如苏中区党委书记粟裕后来在1944年5月所说:“一开始,整个的反‘清乡’是无把握的,只有江南不能坚持的经验。”^② 因此,对于汤团来讲,如何“尽可能地保存自己的力量,消灭敌人的力量”^③,这是一个必须当机立断予以解决的问题。据当时任苏中四地委书记的吉洛(姬鹏飞)、地委敌

① 转引自《苏中四分区反“清乡”斗争》第377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85年8月。

② 1944年5月《苏中区党委会议记录》,江苏省档案馆藏。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06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二版。

工部长陈伟达的回忆,以及有关文献记载,当时苏中四地委曾经作过反复的考虑,设想比较了几套方案。^①

第一,就地坚持武装斗争。这在当时的条件下是很困难的,因为汤团无论是数量上、装备上与投入“清乡”的日伪军相比较,都处于劣势;而通海地区又在日伪的“卧榻之侧”,日伪要夺取海启,必定首先控制这块地盘。拿有限的兵力去与数量上占绝对优势、武器装备精良的日伪军硬拼,无异于以卵击石,显然不符合尽可能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战略原则的。

第二,同新四军主力部队一样,跳出日伪的“清乡”圈,相机作战,打击日伪军,另派精干的武装插入这一地区,与日伪军周旋,开展游击战争。这在当时也是不现实的。汤团是一支地方抗日武装,要离乡背土拉出去,给养、活动地域等一系列问题很难解决。如果另派精干武装插进去,在党的力量本来就比较薄弱的“同情区”那是很难站得住脚跟的。

第三,就地分散隐蔽。这样,虽然能够保存一部分力量,但损失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一旦形势好转,要将这支部队重新集结起来,也是困难的,甚至这支历尽艰辛组建起来的武装将不复存在。

那么,有没有更好的选择呢?根据华中局有关反“清乡”斗争总的战略指导思想,苏中四地委分析了汤团的情况,提出了让“汤团”整团打入伪军的设想,并将这一设想报告了苏中区党委。苏中区党委请示中共中央华中局,华中局批准了这个计划。于是,苏中区党委于3月初派党委委员、苏中军区政治部主任钟期光和苏中四地委书记吉洛等亲赴通海地区,找汤团负责人汤景延、沈鼎立等秘密部署汤团打入敌伪的任务。现在看来,华中局批准这个计划,是有充分依据的。

首先,从汤团本身看。汤团的前身是通海自卫团和崇明警卫

^① 1944年苏中区党委敌工部《为配合反“清乡”斗争汤团伪装投敌及暴动出来始末》,南通市档案馆,下同。

团，两支地方抗日武装，与新四军正规部队相较，它的面貌比较“灰色”，不怎么容易引起日伪的注意。日伪对这种部队，也往往异于对新四军正规部队的策略，较多地采用收买、拉拢的手段。

其次，这支部队的主要领导人汤景延，也有着与众不同的经历。他大革命时期参加过国民党，抗战军兴，又投奔到国民党鲁苏皖游击总指挥部李明扬的麾下，后来又自己组建抗日武装。丰富的阅历，使他熟谙官场和旧军队中的生活方式和管理方式，并与伪军中的一些中上层官佐有过这样那样的交往，这样，遇到特殊情况就能应付裕如。

第三，汤团中有较强的党的力量。据当时的一份调查报告统计，汤团打入伪军时，有中共党员 37 人，主要其层领导骨干，绝大部分是中共党员。原汤团副团长沈鼎立在回忆录《特殊的战斗》中说，由于党员与组织之间采取的是单线联系，许多党员的身份没有公开，因此党员的实际数量远远超过调查报告中披露的 37 人。^①这个说法当是可信的。汤团的主要负责人汤景延是没有公开身份的中共特别党员。后来事实证明，这批共产党员，是汤团行动的中流砥柱。

第四，汪伪在苏北主要有两股势力。一股是以伪苏北“清乡”主任公署主任张北生为首的新派汉奸势力，他不但控制了伪国民党的党务办事处及政治工作团，还控制了参加“清乡”的地方保安团队；另一股势力是以特工总部苏北实验区南通区区长姜颂平为首的特工势力。姜颂平是特务头子李士群的亲信，凭借其后台硬，以及遍布各县的特工站，气势咄咄逼人。张北生和姜颂平虽然在效忠日伪方面有其一致性，但利用“清乡”扩充自己的实力，争夺在这个地区的统治权方面又互不相让，这就给汤团提供了一个利用张、姜矛盾，采取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肚皮里的特殊战术的机会。

另外还要说到一点，就是通海地区的特殊地理环境和它在反

① 《苏中四分区反“清乡”斗争》第 170 页。

“清乡”斗争中所处的战略地位。对于苏中根据地来说，南通、如皋两县的反“清乡”斗争更加艰巨复杂，尤其是通过沿江港口与上海等地的交通联络将陷于停顿，通过这些港口向根据地输送军需民用物资将成为不可能，人员交通也将受到严重影响。因此，保持对这块地区的控制是至关重要的，而要控制这一地区，在当时的具体条件下，则非汤团莫属。

上述五点，实际上就是汤团采取特殊策略的主客观条件。同时，为了使汤团行动能做到万无一失，华中局和苏中区党委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派富有政治工作经验的顾复生任汤团的政治委员，公开身份则是“汤公馆”的帐房先生，在党内提出“变换斗争方式，坚持原地斗争，从敌人五脏里炼出来，配合反‘清乡’工作”；在党外提出“变换斗争方式，保卫家乡”；规定“支部书记以上干部，可以明白事情的真相”，“要求每一个党员，在穿起黄衣服后，一切行动按照党的决定去做”，“并且向每一个党员说明，党没有离开你们，永远同你们在一起”。^①此外，党内采取单线联系的方式，团部建立了党的总支委员会。在驻地附近设立了秘密电台，以保持与上级的联系不致中断。

在打入的手段与时机方面，也进行了慎重的选择。抓住对方急于扩充实力，向上司“报功”的心理，提出了参加“和运”的条件。4月16日凌晨，汤团精心安排了一起与新四军“枪战”的事件，枪毙了一个叛徒，改换了番号，投入了一场新的特殊的战斗。

汤团异乎寻常的行动，正是从战略的高度，为保卫整个苏中抗日民主根据地，为争取反“清乡”斗争的胜利所作的正确决策。

二

对汤团持批评态度者的论点之一是，以一团之众打入伪军，本

^① 《为配合“清乡”斗争汤团伪装投敌及暴动出来的始末》。

身就是一种冒险。但是,我们如果联系到当时的现实,就不难看出,这种冒险是迫不得已的。事情往往是这样的,在敌对势力相对强大,革命力量相对弱小的情况下,为了求得革命的发展和胜利,革命者从战略的高度考虑,常常采取一些异乎寻常的甚至看来是“冒险的行动”。事过境迁以后,对于已经成功的“冒险”,我们不能不佩服决策者的胆略。汤团行动的成功,不仅在于它最终将部队拉回了根据地,而且在于它发挥了其它抗日部队所不能发挥的作用,为苏中反“清乡”斗争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第一,汤团打入伪军后,在一个时期内保持了原建制和驻防地。在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前沿保持了一块缓冲地带,减轻了根据地的压力,有利于抗日军民的坚持。因此,日伪开始“清剿”时,首先把注意力集中在南通县的西部地区和中部地区,而通海地区直到1943年6月汤团被“整训”、调防后日伪才开始推行伪化措施。

第二,汤团在打入伪军的过程中,较好地保存了自己的力量。汤团打入伪军的时间,长达五个多月,这五个多月,确实是充满了惊涛骇浪的五个月,稍有不慎,即有全军覆没之虞。在日伪的严密监视之下,汤团指战员经历了点验、改变番号、分散整训、分兵驻防等严峻考验。由于汤团领导能处变不惊,几次都化险为夷。据统计,汤团从伪军内部暴动出来时,“拖出人员366名,步枪460支,掷弹筒13只,轻机枪11挺”,“缴获轻机枪1挺,短枪7支,步枪40余支,现款5000余元,拆毁季家灶、金余、东社、南濠港桥等据点工事碉堡数座,杀死金沙特工6人……”,而汤团仅损失“汤公馆娘姨1人,骑岸炊事员2人”。^①

第三,1943年9月29日,汤团在驻地北刘桥、石港、五总、季家灶、骑岸、金沙、濠港桥、二鸾、三余、新正、四甲坝、金余、余西等十几个据点同时暴动成功,在南通县警卫团的接应下,胜利地回到了根据地,这无疑是给当时“清乡”已经“清”得焦头烂额的日伪以

^① 《为配合反“清乡”斗争汤团伪装投敌及暴动出来始末》。

沉重的打击。据当时的敌伪档案记载,汤团行动的次日,各个据点的告急文书接连不断地送到南通城伪苏北“清乡”主任公署。负责节制汤团的日军大队长山本受到“严重警告、记大过一次”的处分,张北生也因此丢掉了伪苏北“清乡”主任公署一顶兼“参谋长”的乌纱帽。

第四,汤团打入伪军以后,以解决部队的给养为名开办了由汤景延兼任总经理的“协记公行”,总行设于海门“汤公馆”,另在宋季港、牛洪港、青龙港设立了分行。协记公行以经营粮食、禽畜、蔬菜为名,掩护根据地干部进出据点,并为根据地购买、输送物资。这期间,苏中四地委副书记钟民的夫人王本英,就曾在协记公行的掩护下,在海门县城养病。

另外,汤团打入伪军期间,利用与日伪联防的条件,获得了不少重要军事情报,并利用多种机会,将一些军火秘密运送给苏中四分区主力部队。汤景延还利用李士群、姜颂平与张北生之间的矛盾,进行了大量的分化瓦解工作,有效地保护了自己。

汤团曾经在苏中反“清乡”斗争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如果说汤团行动是“冒险”的话,那么这是一次成功的冒险,这是值得的冒险。当然,我们在评论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时,不能以成败论英雄。但确实确实获得成功的英雄,是不应受到指责的。

三

我们肯定汤团行动,是肯定它在苏中反“清乡”斗争中的作用。我们并不讳言汤团行动中,产生过若干问题。这些问题,有的是不可避免的,有的如果把工作做得更好一些,也许是可以避免的。对这些问题要历史地、辩证地进行分析。

首先,汤团在采取行动时,不可能在当地干部、群众中公开讲明行动的真实意图,因此,当时舆论界和根据地内部反应较为强烈。汤团采取行动后,日伪借机大作文章,伪《江北日报》发表了《欢

迎汤沈两团长》的社论，吹嘘“这是清乡的第一炮，是清乡中的第一件大事”，并声称：“要击溃共匪，最有效的战法，就是瓦解其内部，争取其觉悟的部队，参加和运。”^① 伪苏北“清乡”主任公署张北生，更是手舞足蹈，敌占区群众产生了汤团真投降的假象。在根据地内，一些干部群众，对汤团行动一方面痛心疾首，另一方面，对反“清乡”斗争的前途产生了一些悲观情绪。这些不能不说是汤团行动带来的消极影响。当然，在根据地内也有一些干部、群众，在审慎地分析了汤团行动以后，认为汤团是一支人民的武装，不可能真的去投降汪伪，汤团行动可能是一种权宜之计。但持这种认识的人毕竟是少数。^②

其次，在五个多月的时间里，汤团的绝大部分干部战士在险恶的环境中，经受了考验，表现了高度的组织纪律性和威武不屈、富贵不淫的高贵品质。但是，由于敌我斗争形势复杂，特别是日伪一刻也没有放弃吃掉汤团的企图，他们利用各种方式拉拢、分化、瓦解汤团干部、战士，致使个别人蜕化变质。突出的事例是汤团参谋长苏农，经不起斗争的考验，与伪军头目，敌特分子勾勾搭搭，幸亏汤团领导发现及时，采取果断措施，消除了隐患，避免了重大损失。

第三，由于是一个团的部队打入伪军，为了保密起见，又不可能把真相告诉所有的战士。这样，部分战士因不满意于日伪的歧视，更不愿意背被人唾骂的“和平军”的恶名，而开小差离开部队，使汤团的部队整体战斗力有所削弱。

第四，汤团虽然在一段时间保持了原建制和驻防地，但日伪用点编、整训、分防等方法来割断汤团领导与基层的联系。特别是8月份南通城整训后，派汤团分驻于从北刘桥至四甲坝百余里的防线上，部队又归日军大队长山本节制，另外汤团驻防的各个据点，同时驻有日伪的军警宪特，以掣肘汤团的行动，这就使汤团处于被

① 转引自《为配合反“清乡”斗争汤团伪装投敌及暴动始末》。

② 据原苏中四地委委员洪泽等人的回忆。

动局面,这也是汤团在采取行动之初始料不及的。

尽管汤团行动在一定的时期、一定的范围造成了某些消极影响,但是较之汤团行动在苏中反“清乡”斗争中的历史功绩,仍然是白璧微瑕。

还汤团行动的本来面目,给汤团行动作出公允的评价,这是本文的写作目的。最后,我们以1943年10月苏中区党委敌工部调查报告的两段话,来作为本篇的结束:

“汤团自1943年4月15号(引者注:应为16日凌晨)穿起伪装,到1943年9月29号出来,前后共计167天,以634个人员和枪械钻到敌人心脏里去,做了一趟冒险的活动”。“这种斗争方式,已超过一般敌伪工作范围以外,它是以革命的武装为活动的基础的,用伪装的反戈投敌去取得敌伪的信任,用反革命的面目,参加‘清乡’的姿态,配合反‘清乡’斗争,这样就使得这次斗争,带有浓厚的间谍斗争性质,但它又是与一般间谍斗争不同的,它是以武装为其活动的资本,环绕着武装问题,造成了事情的全部发展过程。而汤团内部的干部和战士,因为政治觉悟的高低不等,参加这次斗争,也有自觉与落后的分别,再加上斗争的对手是奸刁狡猾的敌人,这样,就造成了这次斗争全部过程中的困难、复杂和危险。”^①

(作者单位:戴致君,中共南通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

张廷栖:南通纺织工学院)

① 《为配合反“清乡”斗争汤团伪装投敌及暴动出来始末》